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传播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书系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主编 何明 副主编 郭净 陈学礼

云南乡村影像研究

Collected Papers on Community Media
Practices in Yunnan Province

章忠云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传播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书系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主编 何明 副主编 郭净 陈学礼

云南乡村影像研究

Collected Papers on Community Media
Practices in Yunnan Province

章忠云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乡村影像研究 / 章忠云主编.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2016.6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 何明主编)

ISBN 978-7-105-14405-1

I. ①云… II. ①章… III. ①农村文化-电影制作-研究-中国 IV. ①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9588 号

云南乡村影像研究

主 编 章忠云

丛书策划 郭净 陈湘

责任编辑 陈湘 钟美珠

书籍设计 吾要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图文制作 吴焯源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500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ISBN 978-7-105-14405-1/J·727(汉 372)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30 0871-65333080 发行部电话:010-64227665



章忠云

藏族,语言学硕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民族文化保护等工作。曾参与社区影像实践的多项活动,有《云南民族志藏族志——聆听乡音》以及《村民视角》(合作)等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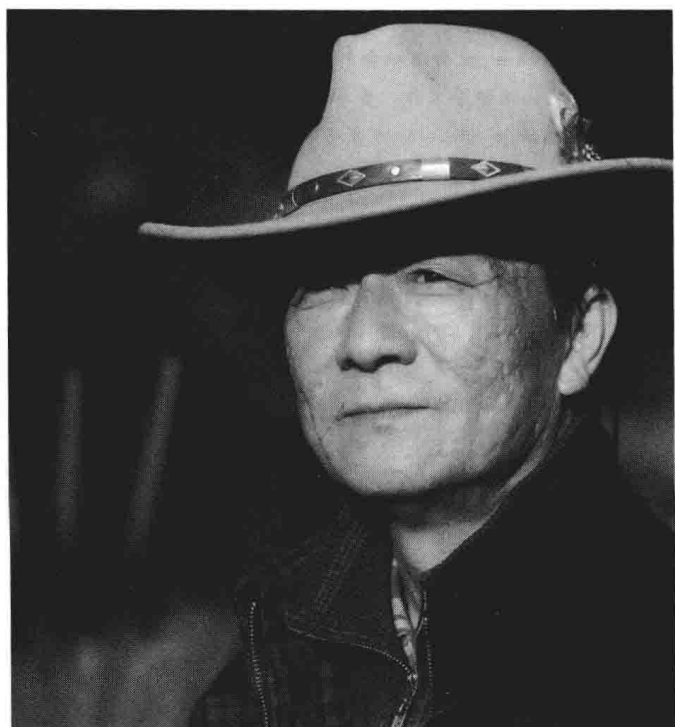
郭净

民族史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致力于西部文化和影视人类学研究,曾参与乡村影像的多项活动以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创办,出版《雪山之书》以及《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合作)、《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合作)等十余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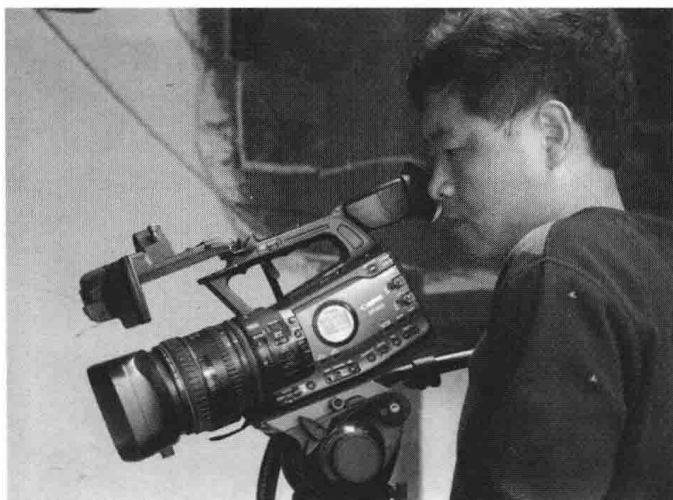
谢春波

人类学硕士，在云南民族博物馆从事研究、翻译和博物馆教育工作。曾参与社区影像实践的多项活动，有多篇论文发表，参与了《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编撰，合作影像作品有《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纪录片。



拉木嘎土萨（汉名 石高峰）

纳西族（摩梭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出版过《母亲的湖》《摩梭达巴文化》《打开女湖》等 17 本专著。获得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首届、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奖；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后改名为“骏马奖”）等。



尔青（汉名 曹红华）

纳西族(摩梭人),丽江市宁浪县永宁乡落水村村民,摩梭民俗博物馆馆长。创办了当地第一个民间博物馆——摩梭民俗博物馆;2006年1月创办“首届摩梭社区电影节”;纪录片作品有《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离开故土的依咪》等。



赵允智

2009年获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学位,多篇论文发表在《电影评介》《南风窗》等书刊。曾担任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大学生评选单元评委,并参与“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现任中国搜索国情频道主编。



王中荣

苗族,昆明市五华区厂口乡迤六行政村台磨山村村民。2004年,开始为村民拍摄婚礼,拍摄自己感兴趣的事情。2007年参加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社区影像实践课题。现有《嫁女送亲》《玩一天》《我们身边的塑料垃圾》《村史·家史》等纪录片作品。



徐何珊

傣族,民族学硕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参与《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的编撰。



和渊

纳西族,影视人类学硕士,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从事人类学电影的摄制和研究。主要人类学影片成果有傣族的《儿子不在家》、白族的《我们的院子——中国西南的白族》、纳西族的《阿仆大的守候》等。



侯文涛(小贵)

苗族(青苗支系),云南省文山县薄竹镇老屋基村委会烂泥洞村民小组村民。2006年6月参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项目此后边谋生边拍纪录片,现有《文山烂泥洞青苗丧葬仪式》《麻与苗族》《芦笙》等纪录片作品。

总序一

影像既是人类的意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生理性要素,也是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的能动性构成。作为动物类的共同性,人类通过视觉等感官获取关于对象世界的影像即客观投射进行记忆存储与识别判断,以之为基础做出行为反应并建构关于对象世界的“信息库”。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性,人类超越了作为信号的影像的“投射——反应”单一功能,赋予其作为符号的无限广阔的能动性空间。马克思在论证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意识性时的比喻耐人寻味,他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也就是说,人类不满足于影像的客观投射功能,运用能动性将影像转化为符合自我意向的主观影像,进而转化为创生性的图画、雕塑、建筑等人工影像符号。不仅如此,人类通过发明与运用望远镜、显微镜、X光、红外线、B超等以延伸自己的感官获得自然的生理感官所无法获得的影像,通过发明照相机、摄像机、电影、电视机、3D扫描仪等影像技术和设备以不断提高影像生产的能力、种类和水平。时至今日,影像技术属于更新最快的领域,影像产品跻身于产量最大的文化消费品行列,影像符号成为受众范围最广的媒介类型,人类已深陷影像的无底深渊之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影像符号凭借其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直观的对应性和直接的关联性的特殊优势而呈现出远远超越其他符号的爆炸式生产方式,把当今人类导向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影像消费者们忙于饕餮丰盛无比的视觉文化大餐而无心深入追问与玩味影像所蕴含的意义,影像制作者们忙碌着完成应接不暇的订单而无暇系统分析与反思影像的生产过程,致使影像制作被装进神秘的“灰箱”而难得精致,影像消费沦为被动的“填鸭”而失去意义,最终结果则是爆炸式生产和抢购式消费的对象都是垃圾,让人类文化“消费至死”!

文字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缺乏直观对应和直接关联,需要通过艰苦学习和能动的意识活动才能联结起来。在“文化快餐”时代,文字产品在与影像符号的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弱势而趋于式微,然而却给人们提供了潜心学习的机会、沉静思索的平台和能动性展演的空间。吟咏四书五经的古典时代已成过往,但我们可能推动影像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互动和互补,用文字符号诠释影像符号所蕴含的意义体系、反思影像符号的生产关系,在“影像热”中掺入些微“冷思考”,给影像符号添加几缕理性光芒,让影像生产萌生一点精致追求,使文化消费增加些微重量。这就是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纪录影像文库》的初衷。

受编委嘱托作序如上。

何明

历史学博士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博导

甲午年末于白沙河畔寓所

总序二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中国的各个民族,一直在用平面和立体的图像及造像纪录、传播着对于社会现实的视觉感受。19世纪中叶,借两次鸦片战争打开清朝闭关锁国大门的西方人拍摄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批照片。^①其后,随着19世纪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外交官的到来,用照片和电影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纪录影像也被引入中国。20世纪初年,在一些城市出现了照相馆,有些兼营电影制作,少数上层社会的家庭也玩起了照相机和电影机。民国历史虽然短暂,影像文化却异常快速地生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在救亡图存等理念感召下出现的边疆影像考察热潮。在这期间,杨成志、江应樑、凌纯声、庄学本、孙明经等一批学人用摄影和电影辅助学术调查;《良友》《中央日报》《文汇报》《申报》《民俗》《东方杂志》《旅行杂志》等报刊亦对边情民俗做了大量图片报道。加之抗战时期美军摄影部队在滇缅战场的影像纪录,都为后人认识那个动荡的大时代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和资料。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和民族大调查,早期民族志电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民族研究者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到20世纪90年代,影像逐渐变成个人和学术表达的重要工具,当代民族

^①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

志电影、独立纪录片运动和纪实摄影突破思想的禁锢蓬勃兴起,为中国的影像文化开启了新的方向。而“乡村影像”经十年的磨砺,培育出了上百位扎根农村和牧区的创作者。他们的活动,不仅培育着地方影像志的新传统,搭建了多元文化对话的桥梁,也为“分享人类学”和“故乡民族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回首百年,纪录影像以其独特的方式,保存了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但相较于实践的丰富多彩,该领域的学术探索却要滞后得多。民国时期的人们怀着紧迫的使命感致力于资料的收集和展示,影像研究在国内或国外均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从20世纪50—70年代,图片和电影创作都被国家包揽,配合民族调查而大量收集的影像既没有广泛传播,也没有深入研究,长期沉睡在图书馆中无人问津。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涌动,才有学者试图摆脱以往大一统的思维框架,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早年参加过“民纪片”摄制,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的杨光海先生,在一本美国的学术论著中发现了“民族志电影”的提法,他在1982年7月6日给云南学者徐志远的信里说道:^①

在国际上有民族志电影,美国已出版了民族志电影理论专著,日本民族学博物馆有数百部民族志影片,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只拍摄了十七个民族的二十多部影片,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民族电影可望振兴发展之时,又遭到了挫折,但我深信这不会长久的,我国的民族志电影事业是党中央制定的,它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第三辑发表了论文《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回顾与展望》,对民纪片的历史作了概括性的梳理,并再次表达了延续这项事业的愿望。在文章结尾,他提出如下建议:

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想对民族科纪片的名称提出个人的想法。现在通用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这一名称,是在196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定

^① 这封信件的手稿由徐志远先生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下来的,经过二十年的实践,这一片名不仅冗长,而且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容易与其他纪录片相混同,改名为“民族志影片”更贴切些,更能突出这类影片的性质特点。当前在国外也将这类影片称为民族志影片。片名的更改,还可以与国外同类影片的名称相一致,以利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①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民族志电影)的概念。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民族志电影正在发生的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唯一主导者,而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的作为,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之后,人们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领域都展开了积极的探索。1976—1981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影组恢复民纪片的摄制,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拍摄了纪录片《白裤瑶》,第二年送法国真实电影节参展,率先打开了与国际影视界交流的大门。同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电影组的郝跃骏等人开始拍摄纪录片《生的狂欢》。1985年,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埃森·巴列克西(Asen Balikci)访问中央民族学院;次年,美国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也到该院访问,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带来了“Visual Anthropology”的学术概念。也是在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学者李德君在美国《影视人类学通讯》(*SVA Newsletter*)发表《影视民族学在中国》(*Visual Ethnology In China*)一文,提出建设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想法。^②到1988年,于晓刚、王清华和郝跃骏三位云南学者首次对“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的概念以及内容做出了全面阐述。他们以《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这篇论文,为中国的纪录片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理论范式逐渐取代了民纪片的模式,成为学术评判的新标准。

1994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在肖锋、李国兴等投资人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和教学机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该所于1995年策

^①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纪录影片回顾与展望》,见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

^②朱靖江:《影视人类学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发展——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载《影视人类学论坛》(电子版),2014(4)。

划和推动了“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亦成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1999年,经过德国学者瞿开森、云南纪录片导演郝跃骏、云南大学学者林超民等人牵线搭桥,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与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合作,申请获得德国大众基金会的资助,在云南大学开办了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最早引进西方影视人类学学科教育的一次尝试。外方对这个项目极为重视,投入了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数码拍摄、录音和编辑设备,并且还提供了一流的图书和影片资源。参与教学的老师分别来自德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均为西方影视人类学界的顶尖专家。从1999年3月至2003年3月,两期培训班共培养了20名研究生。^①在此之后的十年里,这批毕业生分布到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了推动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生力军。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和纪录片创作(包括电视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进入繁盛时期。但这个繁盛,很快被新传媒技术和大众消费的狂潮淹没;而与此同时,以影像为主要手段的自媒体蓬勃兴起日益成长为突破思想禁锢的重要力量。

在这样一个人人可以制造视觉奇观的时代,快捷而方便的影像之眼,更需要文字的观照。如若没有文字对影像加以深刻的阐释和剖析,那视觉文化无论多么缤纷艳丽,都有可能变异成贫瘠的快餐,甚至像“圣战视频”那样,沦为替暴力推波助澜的工具。当然,唯有等待影像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奠基于第一手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具有“自观”立场和“自省”色彩的理论研究才可能获得广阔的天地。可以说,这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有鉴于此,我们在2013年联合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影像民族志工作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清影工作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机构的学人,创办了《影视人类学论坛》(电子版)。在这个学术联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发起了首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

^①参见郭净、徐茵、徐何珊:《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我们也用两年的时间策划了这套丛书,拟从学术的立场,对中国百余年间纪录影像的发生和发展进行初步的总结。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汇集有关纪录影像的研究成果和档案资料,既为深入的学术探索扎下根基,又为以影像为手段的社会实践探索未来的方向,并在写作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关领域的研究队伍。本丛书以影视人类学为基本视点,着重整理关涉中国的民族志电影、独立纪录片和田野调查摄影作品及资料,形成与影像互为解读的文本系列,并力图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多元与共享的“影像数据库”。

在此,对给予我们诸多帮助的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鲍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雷建军(清华大学)、陈湘(民族出版社)、陆文东(广西民族博物馆)、吕宾(乡村之眼)、钟谨(上海大学出版社)等朋友表示忱挚的感谢!

郭净

民族史博士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序言：影像，母语和对话

在《云南乡村影像研究》出版之际，我想把这件事的背景对读者诸君做一个交代。

“乡村影像”作为一种实践抑或理论，应当属于“社区影像”和“参与式影像”的一部分，后两者在国外，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但在中国，它还处于蓬勃新生的阶段，其实践要远远领先于理论。对视觉文化的发展而言，理论通常未能扮演实践指导者的角色，反倒成为实践的追随者。发源于云南的乡村影像，更多是在回应现实的逼迫，而非回应理论的需要。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包括搞科研的学者，起初并没有做什么理论考察，也没有找什么“指导思想”。理论的分析都产生于行动之后，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或施加影响。这并不是说理论对乡村影像没有意义。恰好相反，缺乏理论的反思，使相关的行动走了不少弯路。近几年我们才试图弥补这个缺憾，这本研究文稿，便是做出的努力之一。

社区影像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既没有发生在胶片电影时期，也没有发生在模拟摄像的时期，却与小型DV摄像机的出现同步。反观国外的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就利用手持电影摄影机开始了参与式影像的尝试。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已经出现政府主导的民族志电影，却并未出现个人

电影拍摄与制作的风潮。中国大陆“社区影像”或“参与式影像”的滞后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光有小型设备这个“用”，而缺乏社会—文化环境这个“体”，新的技术并不能自动催生新的事物。在1950—1980年这30年的时间里，拍电影一直是国家的专利。公私合营之后，国家掌握着庞大的电影工业，控制着所有投资及传播渠道，自然也不会有边缘群体乃至个人“发声”的可能。那是一个有社区而无社区声音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旧有的盾牌阵一个个解体，^①基于民间小群体乃至个人的艺术和学术创造活动日益活跃。这种现象在1989年以后依然延续，蔓延至整个90年代。在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研究（主要指少数民族的研究）开始悄然发生变革。此前，即50—80年代前期，单线进化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主导着民族研究的田野实践和理论阐述，大多数研究者汉族，所使用的学术语言为汉语。从50年代起，这语言就挟带着一种“解放者的眼光”，即站在“先进”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去看待“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并力图以学术的方式，辅助执政者将他们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解救出来。至今，这种眼光和主义在学术界仍有市场，典型的表现，是讨论边疆民族“问题”时甚少听到当地人的声音，那些用本土语言发出的声音往往被忽视。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的风潮逐渐波及学界，单线进化理论遭到质疑，我所在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有越来越多的本民族学者，如苗族、白族、纳西族、藏族、彝族、瑶族、独龙族，进入田野调查的行列中来，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就是自己的族群。如今回过头来看，对自身文化的研究，并不能视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弱点，倒可能是一种优势。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学者的长期努力，新的“故乡民族学”已蔚然成形。到了90年代后期，海外舶来的环境和文化保护观念在云南落地生根，部分学者投入“参与式”保护行动中，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觉悟亦随之渐渐生发，“本土的眼光”逐渐显得清晰，又转而影响到学术研究。

^① 参见郭净、徐函、徐何珊：《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452~45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